

中美核关系中的生存、威压与升级

吴日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对中美安全关系的影响近年来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核武器生存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中美战略稳定性；二是随着中国核力量（以及常规力量）的发展，双方力量结构、战略战术等因素可能导致严重的危机升级问题。大致说来，中国学者多关注第一点，西方学者则更关注第二点。最近发表的两篇西方学者的文章都涉及到中国核力量发展以及危机升级问题，一是约翰·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发表于《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上的《中国核战争计划的制订》。¹二是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发表在《战略研究杂志》上的《核演进的意义：中国战略现代化和中美安全关系》。²这两篇文章较好的反映了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关切，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本文将对这两篇文章做一个评论。

二

刘易斯和薛理泰文章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核武器战略概念的六层次框架，并且对这六个层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六个层次的概念分别是：军事战略方针、核政

¹ John W. Lewis, Xue Litai, "Making China's nuclear war pla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8, No. 5, 2012, pp. 45-65. 这一文章的中文版见：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核战争计划的制定》，《领导者》，总第46期，2012年6月。

²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Evolution: 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and U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5, No. 4, August 2012, pp. 447-487.

策、核战略、核威慑理论、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文章还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常规弹道导弹如何整合进中国的整体作战计划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升级危险。作者给出了两种可能的升级场景：一是中国发动的常规导弹打击可能被对方误判为核导弹，从而引发对方基于预警发射的“报复性”核打击，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中国向对方本土发射核导弹；二是中国军方有可能有意利用前述升级风险，从核导弹基地发射常规导弹，从而吓阻对方的直接响应。一如两位作者之前的作品，本文同样体现了他们对中文文献的娴熟运用以及对中国核力量、核战略细节的关注。

在讨论上述六层次概念框架的第四个层次（核威慑理论）时，该文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中国对“核威慑”概念的逐渐接受的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转变的意义。实际上，中国对“威慑”这一概念的犹豫反映了中国对“核威慑”的不同定义。中文里“威慑”概念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应的英文应该是 coercion。但是传统上“威慑”被翻译为 deterrence，而 coercion 则翻译为“核威压”。当中国说中国反对核威慑时，中国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中国反对核威压和核讹诈，但是这一声明在英文中被翻译为中国反对 deterrence，这就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困惑。与此同时，中国在表述自己的核政策时，一方面不得不接受 deterrence 的思路（利用核报复来阻止对方发动核打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使用“核威慑”这一术语，于是使用了“核报复”或者“遏制”等术语。术语翻译的混乱事实上已经给中美战略对话和交流造成了障碍，李彬指出鉴于中国军方使用的术语与西方不同，美国不应该急于推进中美两军之间的直接对话，而应该先巩固现有的二轨和一轨半对话，让军方人员逐渐加入并熟悉彼此的

逻辑。¹为了消除歧义，deterrence 的中文似乎应该翻译为“吓阻”，coercion 则可继续沿用“威压”这一翻译。

文章提到 1969 年中苏冲突时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吓阻了苏联的核打击，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1969 年时中国的核力量过于弱小，苏联并不认为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最终吓阻苏联核打击的是中国的人民战争战略而非中国的核报复能力。据叛逃的苏联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普琴科（Arkady N. Shevchenko）回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认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打击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世界大战，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会导致无休止的游击战争。²对前苏联军事情报官员的采访也证实了上述说法。³

作者提到二炮的“三个（核与常规）双重”原则：双重威慑、双重作战和双重指挥，并认为双重指挥意味着常规和核导弹部队共享同一套指挥控制基础设施，因此对常规导弹指挥控制系统的打击将意味着打击核导弹部队指挥控制系统，从而引发升级风险。这一论断显得有些武断，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核导弹与常规导弹部队共用一套指挥控制基础设施。目前我们也找不到相反的证据，只能从现有公开文献中看到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一方面，常规导弹和核导弹的指挥体制不同，核导弹的使用需要最高统帅部决策，而常规导弹的使用则由战区指挥官决定，因此有理由相信可能存在两套独立的指挥控制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单纯从文字上看，“双重指挥”原则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核部队与常规部队的指挥系统是

¹ Li Bin, “Promoting Effective China-U.S. Strategic Nuclear Dialogue,” October 18, 2011,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1/10/18/promoting-effective-china-u-s-strategic-nuclear-dialogue/5zm8>.

² Arkady N. Shevchenko, *Breaking with Moscow* (New York: Knopf, 1985), pp. 164-166.

³ Lyle J. Goldstein, “Do Nascent WMD Arsenals Deter? The Sino-Soviet Crisis of 1969,”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8, No. 1, Spring 2003, pp. 53-80.

分开的，是完全独立的两套系统。有关中国二炮部队指挥控制系统的文献极其有限，在进一步的证据公布之前，我们暂时还无法明确回答这一问题。

三

柯庆生文章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在核领域获得第二次打击能力对中美两国常规领域安全关系的影响。他首先回顾了冷战期间的两个思想流派：一是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提出的“稳定/不稳定悖论”，即核领域的稳定意味着常规领域的不稳定，因为双方可以放手一搏而不必担心危机升级；二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并得到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支持的“局部付诸偶然性的威胁”，这一流派认为双方都有第二次打击能力之后，安全关系中重要的是决心的平衡而非实力的平衡，因此面对常规战争有可能升级到全面核战争的风险，常规能力较弱但是决心较强的一方可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随后作者指出，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军事现代化已经使得中国获得了第二次打击能力，这一事实对中美安全关系的影响如何取决于中国核战略更趋近于上述两个流派的哪一种。作者的答案是中国的核战略更接近于杰维斯和谢林的模型，并认为这将引发严重的升级危险。在行文中，作者显示了对西方威慑理论相关文献的高度熟悉以及精确的概括能力，将冷战期间以美苏关系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理论运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独特的安全环境，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危机升级问题要比美苏在冷战期间更为严重。

这篇文章论证的关键环节是中国的核战略到底更接近于上述两个流派的哪一个。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一本书，即《第二炮兵战役学》。¹这一论证是有问题的，

¹ 于际训主编：《第二炮兵战役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版。该书是涉密文件，但是可以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公开获得，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索书号：UA837. D53 2004。

因为这本书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核战略。这也是西方学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即认为所有解放军的出版物、解放军军官的著作、论文乃至观点都是权威的，都代表中国的国家政策或体现未来的政策走向。实际上，这本书只反映了二炮的观点。二炮是中国的核导弹部队，但是二炮并不是中国核战略和核政策的制订者，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层才是，二炮只负责核战略和核政策的执行。二炮的角色从以下的事例中也可见一斑，1980年代二炮组织编写了《核战略纲要》一书并下发给二炮机关和院校，这一行为被认为超越了二炮的权限而受到质疑。1989年中央军委曾就此专门对二炮当时的领导班子提出批评。¹作者在文章中将此书等同于中国的核战略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这本书的论述完全符合中国的核政策，柯庆生对该书的解读是错误的。²该书清晰地指出，二炮威慑行动包括两部分，一是运用常规导弹武器实施常规威慑；二是运用战略核武器针对有核国家对中国实施的核威慑进行“反核威慑”。“反核威慑”这一术语表明中国在核领域的威慑行为是被动的、防御性的。柯庆生将之翻译为“a threat of nuclear counterattack”是错误的，应该翻译为 anti-deterrence 或 anti-coercion。至于最具争议的（在中国面临大规模常规打击时）“降低核门槛”部分，柯庆生忽略了该书关键的一句话，即核门槛降低的最低限度是公开宣布核打击瞄准点。正如顾克钢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所谓的降低核门槛只是提升戒备水平以展示决心而非首先使用核武器。³

¹ 徐剑：《李旭阁》，载于第二炮兵政治部编：《第二炮兵高级将领传》，（无出版社和出版年），2006年6月，第437-495页。

² 实际上，这本书和中国公开的政策是如此一致，以至于有美国分析师认为这本书一定是中国的战略欺骗。Larry M. Wortzel, 'China's Nuclear "Leakage"', *The Diplomat*, August 7, 2012, <http://thediplomat.com/china-power/chinas-nuclear-leakage/>.

³ Gregory Kulacki, 'Chickens Talking With Ducks: The US-Chinese Nuclear Dialogue', *Arms Control Today*, Oct. 2011, www.armscontrol.org/act/2011_10/US_Chinese_Nuclear_Dialogue.

柯庆生的文章还体现了由于文化背景、术语、语境的不同而引发的误解。中国学术界使用的术语比较接近美国学术界，而中国军方的则与之有较大差距。柯庆生利用美国成熟的战略分析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军方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企图以此总结出用美国术语定义的中国的核战略，其结果不令人满意。例如“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双重威慑”、“核力量作为常规力量的盾牌”这些术语，其中文本意指的是常规冲突中对方会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因此中国需要核力量进行“反核威慑”，以对付敌人的“核讹诈”。柯庆生则将之解读为中国会综合运用常规与核强制手段来达到外交目的。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柯庆生没有提及 给定中国的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中国如何对他国进行核威压？要进行核威压的前提是向对方传递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信号以强迫对方做某事，中国的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政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放弃了进行核威压的权利。批评者可能会说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不值得相信，而且中国随时可以取消该政策。但是，中国对这一政策的长期坚持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很高的门槛使得中国难以放弃这一政策。美国一直拒绝不首先使用政策意味着美国想保留进行核威压的选项，这并不是说美国可以轻易的决定对他国进行核威压或者说美国进行核威压的可能性很高。

四

两篇文章都提出了中美冲突升级与危机管理的问题，这的确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美两国有可能因为台湾、南海、东海等问题而卷入冲突，常规冲突有可能由于双方力量结构、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原因而升级为核战争。具体而言，

中美冲突升级的原因包括：第一，通过整合在核、常规以及导弹防御领域的优势，美国有可能获得对中国的解除武装打击能力，进而可以将这一优势地位转化为强制性权力，使得冲突从常规层次升级到核层次。基辛格曾于 1971 年表示：“我们没有对苏联的解除武装能力，但是对中国我们有。……只要我们拥有解除武装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在局部冲突中控制其行为。”¹2006 年两位美国学者撰文认为美国拥有对中国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但是该文章基于不合理的假定（美国拥有完美的情报侦察能力），其结论是没有意义的。²提高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一直是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的目标，近年来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也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当前的力量结构下，美国没有信心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核武器，但是中美力量平衡未来如何发展则是未知的。特别是美国一直大力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而且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限制，一旦美国部署完成一个高效、大规模的反导系统，那么美国将具有对中国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在此情况下，美国完全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核威压。

第二，由于双方力量结构的原因造成的无意（inadvertent）核升级。中国既有常规弹道导弹也有核弹道导弹，既有攻击型潜艇也有弹道导弹潜艇，在冲突过程中美国可能无法分辨从而无意中打击了中国的核武器或者核武器的指挥控制系统，造成危机升级。

第三，双方有可能利用“局部付诸偶然性的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美国担心中国军方有可能刻意利用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耦合所带来的升级风险来迫使美国让步

¹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inutes of NSC Meeting of Defense Strategy,” August 13, 1971.

² Keir A. Lieber, Daryl G. Press, “The End of MA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p. 7–44.

或者直接发出核威胁来阻止美国介入地区冲突。中国也担心美国蓄意使用常规武器打击中国的核武器或者利用核武器来弥补在局部战区常规力量的不足。事实上，中国比美国更有理由担心核威压。从力量上看，美国在核与常规领域都拥有巨大优势，一个强者发出的威胁自然更加可信。从宣示的政策来看，中国从拥有核武器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而美国则始终拒绝这样做。从历史上看，中国获得核武器后从未对其他国家发出过核威胁，而美国则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的原初动机就是应对美国的“核讹诈”，美国在战略领域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很容易唤起中国这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但是也不用过高估计中美之间冲突升级的危险。首先，中国核武器现代化努力使得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越来越高，近期内美国不大可能获得对中国的解除武装能力。其次，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情报系统对二炮常规导弹和核导弹的部署模式有很好的理解，能大致判断不同类型导弹的大致部署区域，可以识别出不同类型中国导弹的外形特征。这样无意核升级的风险可以大大降低。最后，虽然中美双方内部的确都有声音主张利用核武器来强迫对方做出让步，但是二战后核武器几十年未曾使用的现实使得核禁忌逐渐加强，任何一方领导人都很难主动诉诸核武器来追求外交目标。

如何降低可能的冲突升级风险是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任务。中美两国在冲突升级问题上面临着不同的两难选择。对美国来说，既希望利用核武器显示决心、展示力量，以影响其他国家的决策；同时又希望危机不至于升级到核层次。因此，虽然美国的《核态势审议报告》表示将逐步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但是美国

仍然拒绝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对中国来说，提高生存能力是核武器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但在此过程中却可能引发危机管理问题。为了提高生存性，中国需要对任何涉及核武器的部署、运行、指挥控制等的信息严格保密，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加大了其他国家在冲突中发生误判的可能性。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中美就战略稳定和危机管理问题达成整体谅解，内容可以包括：美国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或其他形式的表述、美国承诺不寻求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接受和中国的相互脆弱性）、美国接受对导弹防御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武器的限制、中国承诺不增加核武器数量、中国增加核武器领域的透明度（如核武器数量的大致范围、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外形识别特征、正式澄清中国没有战术核武器等）。只要中美能够通过对话和交流实现上述谅解，冲突升级的风险就可以降到最低。